

#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朱德红

(枣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00)

**【摘要】**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关键词】**描述翻译研究;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16-03

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原作和译者为中心。译者以“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为准绳,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通过语言的分析 and 对比,在目的语中找到原语的对等成分。这种翻译理论仅仅拘泥于微观的语言层面,以忠实的传达原作的意义为终极目标,看不到语言以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制约作用,带有极高的规约性和经验性。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翻译评论家往往凭借个人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评价译文好坏的唯一标准,主观且带有偏见,不利于翻译批评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浪潮迭起,翻译研究也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将其应用到翻译中来,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摆脱了传统的“忠实”、“对等”翻译观的束缚,文化翻译研究从宏观的文化语境入手,采用描述的方式,客观的对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译入语的文化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碰撞过程中的扭曲、变形和融合。“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sup>[1]</sup>描述翻译研究方法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客观、清楚地认识翻译现象,对于翻译学科的整体建设具有具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个概念,翻译界已是非常熟悉,其最早出自埃斯卡尔皮(Robert 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愿意承认翻译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背

离,那么,那个使人大为恼火的翻译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了。”<sup>[2]</sup>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凭借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最先将其引介到文学翻译中来,这一极富研究价值的学术命题的引入,对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文学翻译以及其它所有的翻译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创造性叛逆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语言文本转向语言外的宏观制约因素,以描写的研究思路,客观再现了文学翻译事实。这一命题的提出,一方面,为描述翻译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创造性叛逆自身的某些特点又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以下笔者将从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两个方面深入展开论述。

## 1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

### 1.1 以译入语为导向,以客观翻译事实为研究对象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翻译实践者这样抱怨:“既然翻译是‘创造’、‘叛逆’,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顾原文,胡译,乱译了?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翻译可言,翻译界岂不是乱了套了?”其实这只是一知半解的凭空感慨。如果他们对创造性叛逆,大到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有如此抱怨。

和传统的翻译标准截然不同,创造性叛逆不是一种指导性的翻译活动指南,引导我们如何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操作。相反,创造性叛逆是从具体的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学翻译事实中总结出的客观结论。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通过考察,研究目的语文化中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事件得出的结论。它侧重的是一种客观描述,而不掺杂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正如描述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所阐释的：“我的努力旨在，对目的语中那些被认为是翻译的事件做出详尽的描述性、解释性阐释。”<sup>[13]</sup>也就是说“描述翻译的目的是对翻译实践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

### 1.2 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批评

传统的翻译观首先肯定原作的中心位置，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忠实的再现原作。“翻译理论家、评论家的工作似乎就是挑出译者不够忠实的译法，对译文作出肤浅的价值判断，或是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派头对译者指手画脚，然后告诉后者应该如何翻译才能忠实的再现原作”。在这种翻译思想的指引下，译者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牢记原作的神圣地位，亦步亦趋，唯恐曲解了原作的意义而遭翻译批评家的指责；另一方面，他们又苦于种种限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译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处境下左右徘徊，找不到归宿。

从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出发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概念，给迷惘中的文学翻译者带来了一线光明。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的具体研究，我们发现，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在译入语中寻找对等的词、句的语言活动。“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sup>[14]</sup>创造性叛逆所呈现的形式是许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首先作为原作的读者，其“创造性叛逆一方面来自他的主观因素——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等，另一方面，也来自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的历史环境往往会影响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方式。”<sup>[14]</sup>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甚至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活动。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的提出，让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翻译及翻译活动。在翻译批评过程中，翻译评论家应该放宽视野，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对比研究，还要考察译者自身以及两种文化，尤其是目的语文化中多种因素对翻译的综合影响。只有这样，翻译作品才能得到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 1.3 扩大了翻译的概念，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让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译者及其翻译。传统议论映照下，译者常常以不忠实于原作而遭谴责，他们的翻译活动或被否定，或被冠以胡编乱造的罪名。例如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他们的翻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却是由于译者及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使然。“严复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只顾追求译文古典优雅，而不理会作品

的内容；只是他处于一个特别的时代，面对一群特殊的读者，而所选择的书籍也很特别，还有的是他自己也有一个特别的翻译动机。面对着这许多今天看来是‘非正常’的因素，我们又怎能以一般什么‘形似’‘神似’、‘忠实’‘通顺’的翻译理论和标准来讨论严复的翻译呢？”<sup>[15]</sup>无独有偶，林纾的翻译也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和林纾本人的经历紧密相联系的。

虽然受到传统翻译理论的排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在当时却起到了轰动性的影响。严复在晚清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倾尽身心所从事的翻译事业，其成就远远超出了翻译本身的狭小范围，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是一点也不过誉的。”<sup>[16]</sup>同理，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严复曾写诗称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综上观之，以描述的眼光重新定位翻译，其意义是远大的。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些译者的卓越贡献，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翻译所起到的深远的文化意义。这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再现，是时代的需要。

### 1.4 有利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整体发展

“创造性叛逆”超脱了单纯的文本研究，从宏观的语言外因素考察翻译，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问题，使翻译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上升到描述翻译研究，我们可以说，描述翻译研究范式的崛起和繁荣是翻译界的一次创新和改革。它不仅“赋予翻译以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明晰的观察视角，它可以使得人们站得更高一些，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以便对翻译研究有一个宏观把握，使得出的结论在理论上更能站得住脚”。<sup>[1]</sup>描述翻译研究使得许多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纳入研究领域，丰富了翻译的历史材料，充实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使我们向翻译的学科化、体系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2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背离

描述翻译研究倡导客观的描述翻译事实，试图远离道德和政治因素，不对描述对象做任何价值判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中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以创造性叛逆为例来说，创造性叛逆虽然客观的存在于文学翻译当中，但是不同的翻译理论家或评论家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叛逆过程或叛逆因素的描述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可能关注译者的个人因素比较多，有的可能将注

意力更多的集中于文本外的文化因素,有的则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描述。

随着翻译文学的地位日益得到承认和提高,翻译以及比较文学界的学者对翻译文学有了更深入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重新撰写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研究的对象或分期有所区别,但作者一致本着客观的原则对已经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事实进行描述。然而,细观现在已经出版发行的翻译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对译者的描述还是对译作的描述,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然描述翻译研究的提倡者们坚信,翻译是多种因素共同制约的过程与产物,译者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操纵,无法超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

文化环境之外,凭什么认为研究者就可以超然于各种影响因素之外,而做到完全客观中立呢?说到底,他们的这种立场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研究中并不可行。”<sup>[7]</sup>

### 3 结束语

描述翻译研究弥补了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应该从微观的角度看视翻译,更应该树立一种宏观意识,从整体上把握翻译研究的文化背景因素。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方法 with 描述翻译研究不是一种互斥而是互补,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是一种全面的翻译研究。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2, 32.
- [2]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 王美华、于佩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136~137.
- [3]Toury 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 2001: 25.
-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87.
- [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105.
- [6]刘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57.
- [7]韩子满.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 外语学刊,2005,2: 100.

## “Creative Treason” v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Be and Against

ZHU De-ho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gdong 277100)

**Abstract:**With the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ditional prescrip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highlights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reveals its limitations and gives place to descriptive approach. This approach examines translations against the macro social-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various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its presence. As a valuable academic proposition, “creative treason”, borrowed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llows this trend. How does creative treason support and expose the shortcomings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undertakes to present further analysis.

**Key word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Creative Treason

(责任编辑:张俊之)